

我 与 世界

華文文學

主 編 陳 遼
副 主 編 湯 淑 敏
吳 穎 文

香港昆仑制作公司

我与世界华文文学

主 编 陈 辽

副主编 汤淑敏 吴颖文

书 名 我与世界华文文学

主 编 陈 辽

副主编 汤淑敏 吴颖文

编 辑 刘 敦

出 版 香港昆仑制作公司

地 址 香港英皇道 989 号新威园 F 座 6 楼 6 号

规 格 850×1168mm 印张 10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962—7397—44—10

定 价 港 币 20.00 元

人民币 20.00 元

前 言

从 1979 年算起，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现已约定俗成，把中国内地之外的华文文学统称为“世界华文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已有 23 年。专著、论著、编著的总数以百计；论文和评论约万篇。但是，现在就写“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为时尚早，条件还不具备。然而，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已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不说别的，内地最早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中间，已经有封祖盛、黄重添、王淑秧、张超等先生逝世。如果我们现在再不从事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工作，将给今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的撰著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出于这样的考虑，陈辽产生了编一本《我与世界华文文学》的想法，得到汤淑敏、吴颖文两位学者的积极支持。于是，我们联名向内地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卓有成就的老、中、青三代中有代表性的学者发出了邀请书，请他们各自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走过的道路进行回

顾与小结。邀请书发出后，得到内地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专家学者们的热烈响应，他们很快给我们寄来了以“我与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主题的文章。已故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家，我们则请他们的亲友撰写已故学者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回忆录。然而，很可惜，直到我们截稿时，有关封祖盛先生与华文文学研究的回忆文章，还没有着落，这只有留待今后补写，本书再版时重新收入了。

也有一些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方面有卓越建树的学者，或身在海外，至今未与他们取得联系；或工作过于忙碌，抽不出时间写作；或过于自谦，不愿意自己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对此，我们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她的前身是《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已经发表过的有关他们研究业绩的文章中选辑了若干篇收入本书，以使本书具有更大的代表性。

从已经收入本书的全部文章来看，这些文章虽然内容各别，形式多样，但都从各人的实际出发，写了自己如何以不同的机遇，对华文文学产生兴趣，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写了他们在华文文学方面的业绩；写了他们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的甜酸苦辣和心得体会；写了他们对今后华文文学研究的打算；有的学者还对21世纪的华文文学研究提出了展望。所以，谁要从头至尾地认真地阅读了本书，当可了解中国内地的华文文学研究是怎样起步的；它的发展历程大体怎样；已经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又存在哪些问题和缺失；21世纪的华文文学研究该

着重向哪些方面努力；也就是说，本书虽非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但是，对内地 23 年来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轨迹，已经基本上提供了一个概貌。

自然，也有若干位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尽管我们向他们发出了邀请书，请他们撰写以“我与世界华文文学”为主题的文章，但是，可能由于他们的通讯地址有了变动；也可能他们手头有更为紧迫的写作和研究任务；或者是他们由于某种原因不再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因此到我们发排本书时为止，还不曾收到他们的文章。这样，本书也就有了“遗珠”之憾。好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随时可以刊登这方面的文章。只要他们的文章一来，我们将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上立即予以刊登。

天下有心人多的是。我们相信，以《我与世界华文文学》为开端，一定会有不少人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为撰写《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做准备。20 世纪“五四”以后，过了 30 年，我国有了现代文学史；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1979 年有了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到 2009 年以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将会出现。果真如此，《我与世界华文文学》一书，能够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做一点铺路工作，我们也就感到十分高兴了！

陈 辽 汤淑敏 吴颖文

2001 年 11 月 30 日

目 录

- | | | |
|----|--------------------------------|-------------|
| 1 | ● 前言 | 陈 辽 汤淑敏 吴颖文 |
| 1 | ● 迟到学术生命的晚来良缘
——我和世界华文文学 | 刘登翰 |
| 10 | ●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黄重添与台湾文学研究 | 何笑梅 |
| 15 | ● 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
——我与台湾近代文学研究 | 汪毅夫 |
| 20 | ● 霞光璀璨 映亮生命
——我与台港文学图书 | 林承璜 |
| 28 | ● 我和台湾文学研究 | 朱双一 |
| 36 | ● 透过这扇窗口
——从《台港文学选刊》看世界华文文学 | 杨际岚 |
| 42 | ● 我爱世界华文文学 | 张默芸 |

- 50 ● 文心天然
——诗人学者饶芃子一瞥 余虹
- 55 ● 我与世界华文文学有缘 潘亚瞰
- 63 ● “半途出家” 赖伯疆
- 69 ● 情系泰华文学 张国培
- 77 ● 我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陈贤茂
- 85 ● 映日荷花别样红
——我心目中的海外华文文学 梁若梅
- 92 ● 一串奋力前行的人生脚印 周文彬
- 102 ● 新学科研究需要胆识与毅力 王剑丛
- 107 ● 台湾文学研究的重镇
——古继堂专访 杨月
- 112 ● 先行者的努力
——记汪景寿教授 计璧瑞
- 118 ● 王淑秧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张炯
- 124 ● 从《白先勇论》到《香港小说史》 袁良骏
- 132 ● 转了一个圆圈
——我与世界华文文学的缘分 白舒荣
- 141 ● 浅浅的履痕
——台湾文学与我 陆士清
- 149 ● 我和世界华文文学：“发展是硬道理”
——三个研究所的创业经历 施建伟
- 161 ● 使命与责任
——我和世界华文文学 王振科
- 166 ● 惭愧之余的感想和思考 朱文华

171	● 信是有缘 ——我与世界华文文学	公 仲
180	● 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与台港文学研究	王宗法
188	● 挚爱,魅力与前景激励我勇探世华文学	粟多贵
196	● 常恨言语浅 不如人意深 ——我与世界华文文学	萧 村
203	● 我的台港文学研究情结	古远清
209	● 苦辣酸甜寸心知 ——我与世界华文文学	赵 朕
218	● 我与世界华文诗	龙彼德
226	● 思想的沃土	黄万华
231	● 回眸来时路 ——我与世界华文文学	樊洛平
236	● 我以五种身份研究华文文学	陈 辽
245	● 我为什么选择了她(附一篇)	汤淑敏
256	● 涅槃的精卫 不朽的精神 ——我的父亲张超与世界华文文学	张 鹰
263	● 我与姚一苇	曹 明
270	● 一路行来……	曹惠民
279	● 我与东南亚华文文学	钦 鸿
284	● 我与台湾文学的不解情缘	吴颖文
291	● 从研究白先勇开始…… ——我与世界华文文学	刘 俊
299	● 世界华文文学选择了我	刘红林
304	● 世界华文文学改变着我的生活	庄若江

迟到学术生命的晚来良缘

——我和世界华文文学

● 刘 登 翰

事情的开始有点偶然，甚或有点“荒诞”：1980年，福州海关感到过去一些年从海外（大多还是香港）寄来的印刷品已经积压太多，根据形势的变化，需要进行审查和清理，该发还收件人的发还，该宣布没收的宣布没收。于是通过省委宣传部希望福建社科院派人参加“审查”。事情落到文学所，那时我刚调来文学所临时负责，找了两位同志参加这项工作。听他们回来说那些出版物堆了一大屋子，有书籍，有刊物，还有画册等。除了少数外文版，大多是香港和台湾出版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文学作品。我记得他们带回来审读的有钟肇政的

《台湾人三部曲》，琼瑶的《我是一片云》和金庸、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等等。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台港文学。当时福建社科院的文学所刚组建不久，研究方向尚未确定，大家各自为战，深感到人少很难包容文学的各个方面，应当突出重点。于是便把当时刚开始热络的台港文学作为研究的方向之一。不过起初我并没有介入，最早介入的是参加海关“审读”的包恒新和张默芸同志。

翌年，由暨南大学中文系牵头联合国内一些单位发起的第一届港台文学研讨会（1981）在暨大召开。由于福建社科院文学所也列名发起单位，我便怀着好奇心前去“听会”。就在这次会议上结识了后来成为挚友的曾敏之、海辛、彦火、陶然、梅子等香港作家。秦松也以他从台湾到香港最后定居美国的多重身份出席了这次盛会。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认识了许多在这片文学研究的“处女地”上最初开垦的先行者。记得有一个晚上，当时还在暨大任教的许翼心来到我房间聊天，谈到夜半三点多，他所提到的港台作家的名字和作品，我一个也不知道，直听得我一愣一愣的，更感到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领域。所以后来我一直把许翼心的那一夜谈，当成是我从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启蒙。

不过当时我刚从呆了近20年的闽西北山区调来福州，从行政打杂归队于文学研究，希望接续的是大学时代就开始的当代新诗研究。那时朦胧诗的论争正热闹，还有几篇文章可写，等浪潮一过，我又有点茫然。深感到福建始终不在当代文学运动的中心，这种站在边缘的研究，难免有点“隔”。长久找不到合适的研究题目，便只有“移情别恋”，花了一些精力去搞创作，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就在这时，第二届台港文学研讨会（1983）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为主承办，我作为东道主之一全程参加筹备。既然当了主人就不能再是“听会”，于是便把原来艰难搜集准备写入当代新诗史的有关台湾诗歌资料，写成一篇文章：《论台湾的现代诗运动——一个粗略的史的考察》。这是我关于台湾

文学的第一篇论文。上面用了“艰难搜集”四个字，实不为过。当时我所供职的福建社科院虽开始购买台港图书，但数量极其有限。大量资料需靠借阅和复印，但复印也不易，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借。还有就是从台港报刊上抄摘，读到一首抄一首，那些年抄录的稿纸居然盈尺。再有就是向香港的朋友求援，使我深为感动的是海辛把他珍藏多年的《覃子豪全集》的第二卷（诗论卷）和张汉良、萧萧编的《现代诗导读》四册都寄给了我；诗剑和巴桐也给我寄了不少书，巴桐寄给我们共同的朋友范方的《十大诗人选集》也转到了我手里。当时住我楼下的日籍华人、翻译家梅韬女士也特地从日本辗转给我带来一些资料，包括最初出版的《笠》诗刊。就是这些艰难得来的资料，竟然促成我后来编选当时堪称规模庞大的《台湾现代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收40位诗人387首（组）作品，近700页）。现在这些书还插在我的书架上，每看到它们就使我感念友情的珍贵，我的幼稚的研究背后，有许多双大手在支撑。

这样我也就慢慢卷入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来了。

不过在最初的几年里，我还是很少写文章。一方面是当时我受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与洪子诚合作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正在进行之中，分不出太多精力；另一方面我对于台港依然陌生，虽然时时关注朋友们的著述，但常有难以满足之感。1986年，为了出席在深圳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台港文学研讨会，我写了一篇文章：《特殊心态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看台湾文学》，即是这一时期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台湾文学作整体审视的一种思考。这篇后来刊于《文学评论》的文章，提出了我关于分流与整合的最初观念，成为后来我主编《台湾文学史》并为其撰写总论的萌芽。

这一时期对我介入台港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还有1984年我初次访问香港。那是我为参与编写的一本对外宣传的工具书

《中国·福建》而到香港校对。初抵境外，对五光十色的香港社会有了初步的认识，尤其难忘的是和香港文学界朋友的见面。经古剑和舒非的介绍认识了当时旅居香港的施叔青，经陶然的介绍认识了也斯，并参观了也斯在香港举办的一个现代诗画展。香港归来时，我还带回了为院图书馆购置的几百册图书，后来我为海峡文艺出版社编余光中诗选、施叔青小说选基本上用的是这次带回的资料；而编黄春明小说选，则是梅韬先生辗转从日本带回的资料。第二年经也斯推荐再次来到香港出席港大亚洲文化中心举办的香港文学研讨会。会前虽然恶补式地赶读了一些香港文学作品，依然不敢撰写论文，只准备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发言提纲。难得的是在这次会上读到了马朗先生关于 50 年代香港现代诗的一篇论文，并见到刘以鬯先生和余光中先生，还沾辛笛先生的光到余光中先生在中大的家里受其盛情的款待，感性认识了这位才思过人且儒雅风趣的诗人。

1988 年，我完成了与洪子诚合作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稿子送到北京。由于不久情况变化，全部稿件从印刷厂抽回重审，并提出了一些我们不便接受的修改意见，以致使此书一直延至 1995 年才得以出版。犹如一个孩子，出生七年，才报上户口。不过此书的搁置，对我并没有太大影响。因为 1988 年完成《中国当代新诗史》后，我已决定把自己工作的重心转到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上来。那时台湾开放探亲，两岸的交流开始频密起来。福建省率先成立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为了不使研究会流于形式，我提议集体撰写一部《台湾文学史》，以作为整合福建省科研、教学和出版各方面力量的一件实事。这一提议获得大家的赞同并得到海峡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很快就进入实施。在《台湾文学史》的撰写过程中，使我感念不已的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黄重添同志。他多年疾病缠身，肝、胃和关节都不好，每次我到厦大和并列担任主编的他与庄明萱商讨工

作，他总要陪我在招待所谈到夜深；分配给他的章节，也总是不挑不拣地最早完成。该书上册在1990年完稿后，我们立即转入下卷的编写。此时他身体已明显不佳，但他对我说：“老刘你放心，我不把稿子写完是不会死的。”果然，在他把稿子提前交给我后就躺下了，终于未能看到《台湾文学史》下卷出版。1993年我到海南岛出席“罗门蓉子文学世界”的学术研讨会，遇到台湾的林耀德先生，谈起他也接触过的黄重添的过早去世，感慨万千。林耀德表示，他回台湾将努力争取一笔资金，在大陆设一个台湾文学研究奖，就以黄重添命名。没料到才过几年，台湾这位最具突破意义的文学全才，也被召回天国。真是天妒英才，人生奈何！

1990年秋天，由福建省作家协会筹划的海峡两岸诗人节，在从厦门经泉州、福州到武夷山而后再回到福州作游览式的诗歌之旅，应邀到会的有台湾的诗人、作家、画家洛夫、姜穆、古月、李锡奇、杨平等，香港的诗人秦岭雪、张诗剑、梦如、路羽等。这是我和台港诗人较深交往的一次。由于此次结缘，经李锡奇、古月夫妇的牵线，我和福建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袁和平于1991年底结伴访台。这是大陆作家第一次受到台湾方面的正式邀请，所到之处，便也倍受关注。半月行程，访问了台湾许多文化机构和文学社团，见到了许多我在撰写台湾文学史时就已慕名的作家，并带回了他们赠送的大批图书。此行见闻，我曾与袁和平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写过一篇四、五万字的《台湾半月行》，刊载在1992年的《人民文学》上。但对我深具意义的是，半月行程，加深了我对台湾社会与文学的认识，感到刚完成的《台湾文学史》存在许多不足，但已无法补救，只有留待以后了。不过此行与台湾作家、诗人的结缘，更增强了我把台湾文学摆在我研究方向首位的信心。

1994年，我正以连载于《台港文学选刊》上的《台湾诗人

十八家》和《台湾女诗人十二家》为基础，撰写一部台湾诗歌的专论。然而，一件突来的不幸，几乎将我击倒，使我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在一种神情恍惚的、如刀剜心的疼痛之中。书是写不下去了，而与出版社签约的交稿日期一拖再拖，最后只好邀请曾与我多次合作的朱双一兄帮忙，这就是后来由我们两人共同署名出版的《彼岸的缪斯》。在这段日子里，承香港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梁锡华先生的支持，邀我到香港进行四个月的客座研究，让我暂时离开这个带给我巨大精神刺激的城市。一些香港朋友，闻知我的遭遇，也常来陪我。对此我常怀感激，在我生命的黑暗日子里，是他们帮我度过的。在港四月，为了转移注意力，依然只有读书。或许因为刚完成《台湾文学史》，兴趣便转向香港文学。后来《香港文学史》的撰写，便也缘此而起。说来抱歉，最初提议撰写《香港文学史》的，是当时尚在三联书店任职的梅子和舒非。后来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议了经年却未能进行。到1995年秋末我访问澳门，曾敏之和犁青两位先生过澳来看我，并提出由他们筹集一部分经费，由我邀约大陆学者合作撰写。因此《香港文学史》赶在香港“九七”回归之前完稿，也交给了由犁青先生任社长的香港作家出版社出版。对此，我于梅子和舒非怀有深深的欠咎。

我在《香港文学史》的后记中说到此书的撰写历时年余，便引来一些嗤议。说以一年时间怎么敢写香港文学史？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此书动笔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的学术准备。我个人不必说，80年代以来便多次访问香港，一直关注香港文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情况，其他诸人的情况也大约如此。1994年我在岭南客座时，还将此一设想征求梁锡华先生的意见，并得到他的支持，分别邀请拟议中的合作者杨健民、颜纯钧、王光明也来岭南客座，以便了解香港社会和搜集资料。另一位合作者楼肇明也得到中大黄维梁先生的帮助，以他“香港文学研究计划”的名义来港

访问和搜集资料。另外的合作者如费勇和钟晓毅，对他们承担撰写的部分（通俗文学）早有多种专著出版。我所说的“年余”，实际上只是动笔的时间。

《香港文学史》出版之后，毁誉参半，不像《台湾文学史》那样，好评如潮。这是意料之中的。其实我心里清楚，把《台湾文学史》说得多么好，其实未必；说《香港文学史》怎么差，也不尽然。我自信，就总体水平而言，《香港文学史》应当不会比《台湾文学史》差。虽然两者都不成熟，都有许多缺点，甚至错误，都是一本粗浅的入门之作。在此之前我一直很少撰写香港的文学评论，一是当时注意力集中在台湾；再是香港的朋友太多，而文学圈子又太小，说好说坏都易直接或间接地让人不高兴。所以最初梅子和舒非提议我撰写《香港文学史》时，我曾半开玩笑地说：那我就得准备挨骂；而且决心：与其零零碎碎地挨骂，不如集中地挨一次骂。这回，果然是很集中地挨了一次骂。其中最厉害的是某报上的一篇文章，甚至准备提起诉讼。不过后来突然销声了，因为有人在报上公布了他们的一些文件，证明我书上所写的事并没有错。此事现在细谈为时尚早，应当作为一桩文坛逸事，留供以后回忆。

《澳门文学概观》的撰写也是一种偶然。还在岭南客座时，有一天，在澳门大学任教的青年诗人郑炜明来看我，说澳门基金会的吴志良委员想约我去澳门一聚。经过十分繁琐的手续，我在中秋节那天由香港到澳门，吴志良先生设宴请我，原来澳门基金会近几年在吴志良先生的实际主持下，与国内许多学术机构都有合作关系。因为澳门有十万福建人，便很想能与福建社科院开展合作研究。这当然很好。我回榕后将此事向福建社科院报告，获得支持，便于当年11月由社科院组团访问澳门，并与澳门基金会签订了五项合作研究的协议，“澳门文学发展状况研究”便是其中一项。此次我选择的是另一种合作方式：与澳门作家学者直

接合作。因为当时感到，澳门地方不大，人也谦和，文坛处于初萌时期，彼此间芥蒂不多；而内地学者，对澳门文学的情况基本茫然。采取与当地学者合作的方式，应当比全由内地学者撰写会更便捷一些。事实虽不全如自己所想的那样，但应当说此次合作，还算比较顺利。

我在《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和《澳门文学概观》三部著作中，均采取合作撰写的方式，此事在学界的朋友中，略有议论。我在《香港文学史》的后记中，也略作回应。我写道：“合作研究在学术界，历来臧否不一。1993年我与几位朋友合作完成《台湾文学史》之后，本想不会再做这类研究了。不意接受了《香港文学史》的课题，又重新邀集了一些朋友来合作。其实，合作研究并非绝不可为，也非必得为之，就看你做什么课题和怎样进行了。那种不做具体分析，把所有合作研究都贬为‘大杂烩’的说法，则有点轻率了。尤其是像这类主要是为读者提供一份他们急需了解、却尚属陌生的文学现象的概括性的初步描述，合作研究反倒具有它集思广益、利于发挥个人长处和时间快的优势。”所以选择合作研究，在我个人，也有一点内心的隐衷。我们这代人为政治运动耗去的生命太多，待我回到学术岗位，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可能太多。面对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尚未经过深垦的陌生的领域，想做、需要做和可以做的事情太多。而如果仅仅依靠一己的力量，无论哪一部文学史，势必都要花费很长时间，实在以我毕生之力也来不及做完的。因此我愿意集合大家的力量，也把我的思考化作共同的思想资源，去完成我认为急需完成的一些工作。几部文学史都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去进行的。虽然我知道，这样的研究必然带来一些先天性的不足，但我自甘把它当作一块最初的踏脚石，为后来者去攀登新的高峰垫脚。

在完成了台港澳三部文学史之后，我曾经希望把它们和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一整体性的研究，即不是从某一地区的